

中国传统经典荟萃

中华对联精粹

孙铭阳 编著

品读经典文化 开启人生智慧

可俗可雅，翰墨书香门槛处，亦庄亦谐，风流文章天下传。《中华对联精粹》以中华民族悠久的国学文化为主线，详尽地介绍了我国的传统对联，其涉及名家作品、专业用联、节日联、贺寿联、婚嫁联、生育联等诸多方面，集趣味性、知识性与文化性于一体，读后使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华对联精粹

孙铭阳 编著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对联精粹 / 孙铭阳编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5.6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荟萃)

ISBN 978 - 7 - 5344 - 8627 - 2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对联 - 作品集 - 中国
IV. ①I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7695 号

特 约 策 划 王继雄

策 划 编 辑 毛东妮

责 任 编 辑 刘晓娟

装 帧 设 计 刘国辉

封 面 设 计 候 泰

责 任 监 印 徐 屹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北京凤凰千高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mscb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5344 - 8627 - 2

定 价 49.80 元

营销部电话 010 - 64215835 - 801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10 - 64215835 - 801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荟萃》编委会

主 编:林可行

副主编:陈继武 潘志强 牛洪义

编 委:张脉峰:中华诗词学会理事,《诗词之友》杂志主编

刘太品: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

莫真宝: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负责人

张 涛:银川市作协副主席,银川诗歌学会会长

张红旗:《太原晚报》副总编,摄影家

王 童:《北京文学》社长助理

王博生:《人人文学》主编,摄影家

王爱红:《文艺报》主任

邵建国:《中国散文报》中华散文网主编

孟 霖:《兰州晨报》史前文明研究专家

巴 一:著名作家

东 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古典诗词研究专家

张富英:《作家报》总编

陈继武:武汉《菲柏菲小馆》馆长、收藏家、书画家

牛洪义:纸凤凰(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可行:原《中国文艺家》杂志社副主编、作家、诗人

总序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而唐太宗李世民在其著名谏臣宰相魏征死后曾多次对他的大臣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话比培根早了将近一千年。仅此一斑，足以管窥中华优秀文化不仅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博大精深，而且是中华民族承前启后、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中华这座丰富的文化宝库中，她蕴藏的每一部历史典籍，就是一段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缩影，我们熟读中华传统经典，不只是为了熟知和传承，更是为了能从她的优秀历史文化中吸取营养和智慧。

中华民族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其经典文化源头可分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尽管其间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出现过曲折，甚至是断层，但到现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部分依然得以保留和延续，这既是中华智慧的先祖们的丰功伟绩，也是我们的福分和骄傲。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在渊源上源远流长，在思想上也兼容扬弃，而且具有高度原创性和独特性。譬如《易经》，号称万经之首，是中华文明的灵魂和密码，他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为伏羲八卦为始，那时并没有文字，所以八卦。二为周文王承接伏羲八卦，以八八重叠演生六十四卦，周文王父子认为六十四卦以包含宇宙万物，每一卦都有卦辞。后有孔子做传，遂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更是古代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易经》含盖万有，纲纪群伦，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广大精微，包罗万象，中医典籍，古代兵法，风水玄学，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中国早期的思想形态带有一种“宗教神学”的特点，“天”“神”是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可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当时出现了众多的杰出人物，成为了中国思想的象征或代表。按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刘歆的分法，当时共有十家：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其杰出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杨朱、惠施、公孙龙等。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道、墨、法”和外来的佛学，对中国后世影响最大，对中国的传统

思想起了主导作用。除此，其余皆为从属地位，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至于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其产生于魏晋，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命相、风水是古老易经文化的具体应用，是国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符合五行相生、八卦相荡原理。而中医理论则是来源于对历代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的融汇。其内容主要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津液、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医专著《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法、治疗方法等，均可在此书中找到根源。

20世纪20年代初期，随着当代新儒家的兴起，点燃了传承传统文化的薪火，代表哲学家主要有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及第二代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由于诸位大家各自的传统文化功底扎实深厚，独树一帜，学问融贯古今，其教化涵盖儒、释、道，兼及医卜天文、诗词歌赋。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多么卓越的贡献。他们多是学术殿堂的教授、也是生活实践的宗教家、哲学家、禅宗大师和国学大师。

唐代韩愈诗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符读书城南》）梁实秋先生说过：“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雅舍小品选》）钱穆先生曾说：“《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论语新解》）1978年，他曾在香港向中文大学的师生提出了研习《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的要求。

事实上，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化典籍，其文体均为文言文形式，而这种形式至今仍被人们关注，文言文的文章也成为了衡量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重要方面。所以，文言这一文体，包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无论是《论语》《史记》还是《红楼梦》《聊斋志异》，都无不透露着一股源远流长的汉民族文化精髓。诗歌也是一个很平常的文体，但中国的古诗另有一番文化的内涵，无论是春秋时期的《诗经》，还是战国后期的骚体，也无论是汉魏晋时期的古体诗，还是有唐以后的格律近体诗，抑或是宋词元曲等等，都有一股浓浓的沁人心脾的中国味道。正因为如此，中国文体的多样性，也随之展现于世人眼前，从而激发今人延续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欲望。这也是今天我们重新整理这套《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荟萃》丛书的意义所在。

“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新民，在止于至善。”所谓“大学”，实质为大学问，人世间最重要的学问。“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是以吸《大学》《中庸》之醍醐。初读《大学》部分，有振聋发聩之感。再读《大学》，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

语·里仁第四》)的无憾与清爽。《大学》之所以受到2000年多来的学者、统治者、士人的推崇，就在于它极为简明扼要地回答并解决了人生三个重要问题：天地生人的意义，如何去实现天地赋予个体的使命，个人与天下的关系。大学是怎么回答这三个问题的呢？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天地生人的意义在于“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接着，指出实现的方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个人与天下的关系则是“一家仁，则一国兴仁；一家让，则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礼记·大学》)。可见，大学为千古立志作君子者树立了道德、为人处事的标杆，影响了中国千百年来的读书人。

《诗经·国风·卫风》有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告诫读书人，要做有才有德的君子，就必须必须加强修养，使自己变得更加的精致，要时时反省，分秒不可懈怠，努力学习，谨守品行。之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也。“君子必慎乎其独”，一个人要完善自我，尊重自我，对得起天地良心，则应当注重修为，人前人后一个样。因为独处时，最能反应一个人的德行操守。正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礼记·大学》)。”若要是非黑白一眼洞穿，这既需要广博的知识、深厚的阅历，更需要有一颗正直无私的心。也只有心正才能摒弃个人好恶、世俗偏见，正确的去判断。“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尚书·秦誓》)。”强调的是一个人要宽厚仁慈，胸怀如大海，纳万物而波澜不惊；如宇宙，日月星辰运行其间，而静默不语，人有才，应容之、惜之、爱之、举之、助之。是以社会有此伯乐，则中华幸甚。如此，则“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也(《礼记·大学》)。”这就是所谓实现社会大同的标准，就是“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礼记·中庸》)”。

读《中庸》部分，顿悟“中”是圆，“庸”是方，“中庸”就是把“中”的道理用一种最恰当、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语出屈原《离骚》)事实上，方枘圆凿并不是不能相容，中庸之道恰是一种方与圆的完美结合与运用。关于“中庸”，程颐说：“不偏不倚叫做中，不变不更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以“诚”和“中”为基本概念，叙述形而上学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是故，中庸之道，为的是修己治人，内圣外王。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是中庸的宗旨，“诚”是中庸的基础。而“中和”与“至诚”协调，便是君子欲得的美好境界。如若明白了中庸之道，那么，年少轻狂，愤世嫉俗者就可以用平常心对待一切，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明白了中庸之道，就不会一味悲观，也不会盲目乐观，从容地面对生活，对不如意事可以一笑置之，亦可以不

计较平常得失荣辱。我们或许做不成大事业，只能从实实在在的平凡中讨生活。可是，只要我们把这些具体而实在的小事做好，在实在中获得小小的乐趣，又何尝不是《中庸》给现在的我们带来的一些启迪与思考呢？“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语出《中庸》）。”尽管一个人的修为要达到中庸的程度有如此难度，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不能放弃对中庸最高境界的孜孜追求。

把理解历史当作把握人生的一把钥匙。读史就是要求我们自觉地思考自己过去致力于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明了事物发展兴衰的客观规律，吸纳前人的经验教训，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把握人生的现在和将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不断学习、了解和掌握宝贵的中华文化精髓，并因之深深植根于自己心灵深处，而感到喜悦和自豪。

从“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再到“学不可以已……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终日之所学也（《荀子·劝学》）。”我们总是因之深深感到，中华优秀而经典的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总是让人百读不厌，如沐甘露。我们只有把这些中华文明的文化宝藏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才能获得知识的教益，体味其中的意趣，感悟做人的道理，提升人生的境界。

我们真诚地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若能使读者在其帮助下，有所收获，有所提高，有所修为，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如此，我们更加地相信，在我们和读者共同的孜孜追求和发愤努力下，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会进一步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多么令人喜悦的幸事！

胡奇川
乙未年春

前　言

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楹联源远流长，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寝室门板桃符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见《蜀梼杌》），这要算中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对联。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

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我们特经过《诗词之友》的编辑潘东先生联系到当代诗词名家胡奇川先生，主持编辑整理了这本《中华对联精粹》。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新韵与古韵并存。所收名家作品皆为古韵，而更多收集来的近代作品和无法考证作者的作品，则多为新韵。使本书成为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能体现当代楹联创作水准，窥见名作风采，能满足楹联创作者学习需要，又能满足广大群众工作生活实际需要的一本好书，故定名为《中华对联精粹》。

在此，感谢胡奇川先生为此书的出版，所作的工作。

目 录

关于对联	(1)
名家作品	(6)
韩松宇 (天步子)	(6)
潘 涛	(19)
陈东成	(20)
郭省非	(21)
李永年	(22)
涂光雍	(23)
罗 炽	(24)
涂怀理	(25)
姚 禾	(26)
黄金辉	(27)
皮治洪	(28)
罗春生	(29)
邹 立	(30)
章艳萍	(31)
柯 丹	(32)
张恭华	(33)
金桓敬	(34)
阙东明	(35)
曹克定	(36)
姜 彬	(37)
姜天河	(38)

祝大光	(39)
唐家尧	(40)
刘友竹	(41)
王广林	(49)
杨振兴	(51)
林葆安	(52)
王 蓝	(53)
邹博爱	(54)
高森信	(64)
杨明辉	(65)
邓志尧	(66)
李朝华	(69)
李晏平	(70)
胡奇川 (楚汉)	(72)
杨永全	(74)
耿建华	(76)
李 欣	(80)
碎步天涯	(82)
专业用联	(83)
工 业	(83)
工友寿联	(92)
农 业	(93)
商 业	(109)
文 艺	(119)
行 伍	(120)
科 教	(128)
卫 生	(140)
体 育	(142)
行 政	(144)
贺 寿	(150)

男女通用寿联	(150)
双寿联	(177)
双寿纪月联	(180)
男女分月寿联	(184)
婚 嫁	(193)
节日婚联	(193)
洞房婚联	(195)
其 他	(201)
生 育	(242)
贺生子通用联	(242)
丧 葬	(245)
通用挽联	(245)
居 家	(284)
建筑新房联	(284)
新居宅第分类联	(291)
乔迁联	(300)
节 日	(305)
春节对联	(305)
元旦对联	(377)

关于对联

对联（又称楹联、楹帖、对子等），是我国独特的、具有对称美感的、有与诗词讽诵同工之妙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是我国远古先民们在生产生活实践及精神生活实践中追求左右对称的审美观念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我国对联渊源久远。有人说，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对句的雏形。例如《易经·系辞》中，就有这样的句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又如《老子》中，亦有类似的句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知，前后相随。”这些对句（或称偶句、对仗句），尽管对得还不工整，但对偶形式已开始萌芽。

据考，距今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的人面鱼网彩陶盆的内壁就有用黑彩绘出的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从这些“准艺术”器物的制作看，虽然首先是以实用性为出发点的，但其图形无不被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而在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对称审美已经逐步形成认知和共识。事实上，从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半坡遗址出土的刻画在土垢陶器上的符号和图形看，这种与对称审美有关的认知已经在民间广为深入。可以说，对称审美以带有宗教性质的新石器时代的“准艺术”为始发点，逐步引入到了符号文字领域后，这种象形符号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一方面逐步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并日常使用的象形文字，一方面逐步凝定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对称审美观念。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心运，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这一世界上最早的对偶文学修饰手段，对后世创作者影响巨大，并表现在与之有关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在先秦文学中可以看到，在汉代辞赋中可以看到，在魏晋文学中可以看到，在唐诗宋词中则尤为多见。这种基于阴阳辅成、左右对称的审美观的构建与阐发，经历了一个“准艺术”到“纯艺术”的悠久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源于民间的实用生产活动到与宗教精神生活相结合的过程。而对联则首先是人们

已经在具有了对从最初的图形到符号对称性审美观的确立之后才有的。此后，对称审美之于对联，它又经历了一个从源于民间精神生活体验与欣赏，到诸子百家的思想表达与释放，再到食禄仕宦的辞赋著述与陈情；再从文人雅士的闲情讴咏与游戏，最后回归到民间并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原点的过程。这些我们不仅可以在先秦文字文学中看到，还可以从东汉末年创作的赋体文学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中，再到唐代律诗的对仗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对称修辞手法的广泛而娴熟的运用。

真正意义上的对联，应该源于春联，然而春联究竟源起何时，难以准确考证。有的说源于“桃符”。而桃符，虽然成对，但不是春联，只是“门神”而已。到了后来，桃符也没有演变成春联，而是演变成了张贴在门户之上的年画，关于这点，清华大学杨琪教授在他的《中国美术史》第三讲《民间年画》一节中讲述得很明确。关于桃符，汉代蔡邕在他的《独断》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东北有鬼门，万鬼所出入也，神荼、郁垒二神居其门，主阅领诸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由此可见，神荼和郁垒就是驱凶避邪的两尊门神。古代民间在除夕之夜，为驱避鬼怪，便在桃木板或刻或画上“神荼”和“郁垒”两尊神像，悬挂于门户左右两侧，这就是“桃符”。桃符在那时具有“符咒”的宗教意义，所以，桃符应该是最早的以符号或图形作为新春伊始驱邪祈福的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寄托。至于春联，事实上，至少在东晋时期就有了桃符与春联并用的情况。因为桃符只是除夕之夜悬挂于门户左右门扉上的，而春联既可以张贴在左右门扉上，也可以张贴在门扉两边的楹柱上。譬如，相传东晋时期就有大书法家王羲之写春联的故事，他的“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的春联故事在民间流传了 1600 多年。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王羲之之前，早就在民间有了新年张贴春联以求迎新祈福或以文言志的习俗。

至于对联，据清末人谭嗣同曾考证：刘孝绰（南朝梁文学家）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姻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这虽是诗，但语句皆为骈俪，又题于左右门扉上，可以说，这应是我国最早的对联。

宋人张唐英在《蜀木寿机》中记载：“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据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但这种春联，在当时还只是写在宽约三寸、长约六寸的桃木板上，仍称“桃符”。又有人认为，后蜀宫廷题联，早已成为习惯，而孟昶应不是最早题联人。这也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孟昶之前，桃符与春联也通常是分开张挂的，只不过，孟昶将春联写在桃木板上，是使桃符和春联合二为一的第一人罢了。应该说，桃符是在除夕之夜悬于左右门扉上的，主要用于镇邪避灾，祈祷平安；春联则是张贴在左右门扉或楹柱上的，主要用于讽诵明志，渲染喜庆。直到五代后蜀主孟昶时，才有了将桃木板上的神像改为文字书写的对联。于是，桃符和春联就像两股道上的车，一个载着神，一个载着志，一前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但，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民间仍然还普遍存在着悬挂桃符的习俗，包括后来的年画；而张贴春联的情况大多还只是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才有的事情。且不说那时底层的市井农家经济状况如何、是否大多能识文断字，仅仅就请人代写或纸墨一项也是一笔昂贵的开销。所以在贫民阶层的家庭还应是悬挂桃符门神的居多，因为桃符可以续用，来年只不过是将其洗净刷新再挂罢了；而春联则是要年年新写的。

北宋人王安石在他的《元日》一诗中写道：“千户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新桃换旧符，也不一定就是家家户户都是弃用旧有桃木板换上新制的桃木板的，这且不说浪费，对于神，乱扔，也是不敬的。记得少时穷困人家，新年时为了讨得“年年有余（鱼）”的吉祥兆头，酒桌上的鱼自不可少，然新鲜碗口活鱼无钱买，所以席中间那肥硕的碗口鲤鱼也是木制的摆设，年年用、年年洗净装盘浇芡后摆上餐桌，馋馋眼罢了。由此，可以推断，王安石诗中说的“桃符”，还真难以断定指的一定就是新制作的桃木板上书写的春联。也许那时真的仅仅就只是两片桃符而已。所以，春联、桃符、桃木板上书写春联的情况并存也是可能的，而桃符居多则可以想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孟昶之后是有了在桃木板上书写春联的情况的。后蜀为宋所灭后，这种在桃木板上题联的形式，在宋代民间被流传开来，再之后，文人又用纸张代替桃木板写联，逐渐形成习俗也就顺理成章了。

据传，真正广泛地张贴春联和春联寓意行业的倡导者，大约是明太祖朱元璋。据传，朱元璋定都金陵后，在一次除夕前，他传旨：无论公卿士庶，

每家门口都要粘贴一副春联。除夕晚上，他还微服出巡，见到五花八门的春联，非常满意。当走到一家庶民门口时，见没有贴出春联，他很奇怪，一打听，原来这家是以“阉猪”为业的，不好意思写春联贴上。于是朱元璋就精心思索，亲自给这家写出一副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全联并未说出“阉猪”二字，但这个“阉”字的含义却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而且全联对得工整、确切，曲而不浮。但，这也不能断定，春联在那时就已经替代了桃符。不过，正是由于朱元璋的亲自提倡，春联乃至对联这一兼具文学欣赏性和艺术装饰性的表现形式就为大众所接受并被广泛地应用在了各种场合。

对联之所以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不仅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言简意赅、逸趣横生、言志寄思、顿挫有致、上口易记的文学形式，而且还因为它具有左右对称、空灵磅礴、点缀氛围、突出主旨、玩味无穷、触发视觉之美的装饰性效果。一对美的联语文字，加上遒劲俊逸的书法，并将之或书或挂或刻挂于门扉左右或楹柱之上，就会令人警醒受教，心神入境，留恋不忘。

我们认为，春联起于东晋，定于后蜀，播于两宋，盛于明清。尤其是对联，在明代小说的那些故事中，驿馆、庭院、寺庙、屋宇等大门上的对联我们可以随处可见。也正因为春联这一文学形式具有它特殊的、与生俱来的思想性、趣味性、讽诵性、简明性、艺术性和可以悬挂张贴的、左右对称的装饰性以及独具汉民族风俗审美意义的欣赏性，所以后来的文人雅士就借此根据自己的志趣情感和喜怒哀乐制作各种精美联语，即兴悬挂、绘书或镌刻于厅堂、屋宇、庭院、庙观等场所的楹柱之上，以之讽诵陈情，抒情言志。

自古以来，前辈名家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思想健康、结构新颖、语言鲜活、文字精巧的对联，这些都是作者竭力炼字炼意，讲究阴阳协和，追求巧妙构思，寄予深厚情感，直面跌宕人生，吸收古典精粹的结晶，读来无不意韵浓郁，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给人启迪。

一副好的对联，必须认真构思，发自肺腑，倾注真情，必须做到信、雅、达，或状物写景，或抒情寓意，或缅古叙怀，或讽诵陈情，或箴诫明志，都要讲究自然流畅、立意新奇和朗朗上口，如此，再加上酣畅遒劲隽永的书法糅合在一起，使二者互相映衬，就会更能显出它的神彩飞扬和瑰丽典雅。

总之，对联是运用我国汉语文字字形方正这一独一无二的书写特点和词

组精炼、结构优美、音节分明、声调匀称、便于形成对句等功能，在左右对称与阴阳协和的艺术审美观的原则引导下，制作并完成的一种有别于其它文学种类的独特文学形式。它是带着浓郁汉民族传统审美观念来描述客观事物、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一种特殊的可观、可品、可诵的艺术表现。它具有诗、词、赋中对偶骈俪的某些修饰特点，但比诗、词、赋更精炼、更工整、更具欣赏性。这就是它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是它为什么在我国历久不衰、为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所喜爱的缘故。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明珠，也是汉族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独树一帜的伟大贡献。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随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随着国内国际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繁荣，对联这一兼具欣赏性和装饰性极强的艺术瑰宝，会大放光芒，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接受和喜爱。